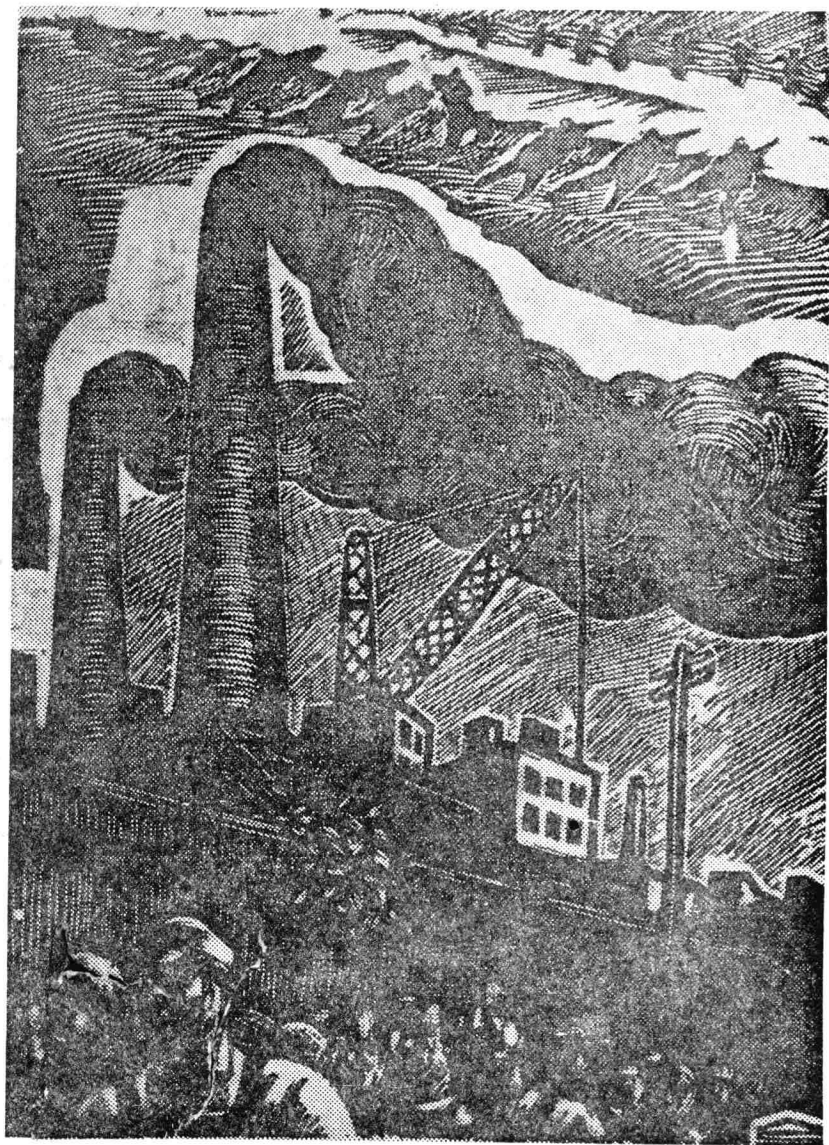


# 成都报刊史料专辑

第二辑

成都晚报报刊志编辑室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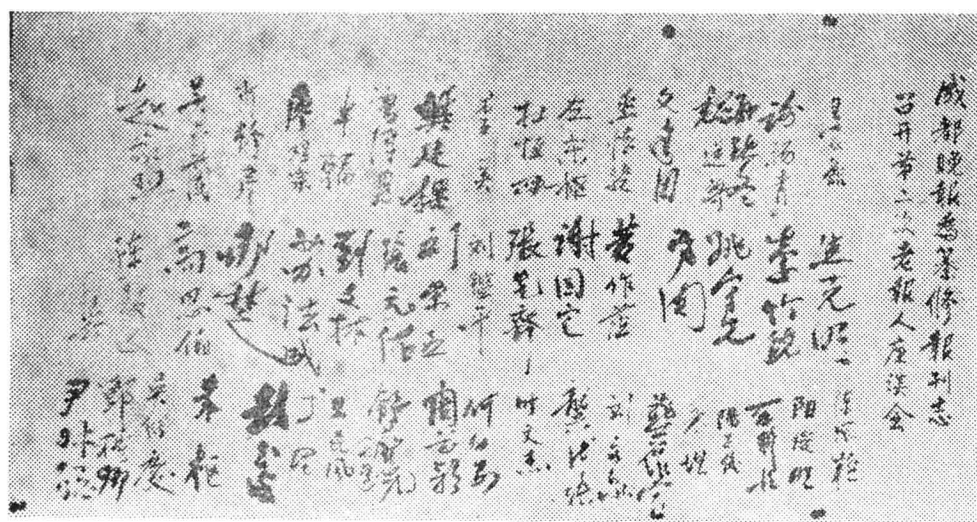
前方浴血抗战  
后方加紧生产（原寸）

张漾兮 遗作

# 成都晚报召开第二次老报人座谈会



成都晚报社总编辑凯兵（前排右起第二人）在会上讲话。



成都晚报记者赵白摄  
出席座谈会的老报人签名。

## 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二辑 目 录

|                                         |                    |
|-----------------------------------------|--------------------|
| 抗战前至抗战初期的《四川日报》 .....                   | 张爱和 陈明泉 [2]        |
| 《四川日报》简况 .....                          | 刘彦槐 [16]           |
| 召开《西方日报》部分老同志座谈会 .....                  | 市委党史办公室 [18]       |
| 抗战时期随团慰劳川军散记(上) .....                   | 阳子俊 [19]           |
| 我所了解的《星芒报》 .....                        | 杨 槐 [28]           |
| 回忆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战斗岁月 .....                 | 罗石生 [30]           |
| 难忘的三年半 .....                            | 蔡应同 [39]           |
| 我在二十年代经历的四种报纸 .....                     | 陈风梧 [45]           |
| 徐佑根烈士与《西陲日报》 .....                      | 张秀熟 [48]           |
| 忆徐佑根二哥 .....                            | 徐雨苍 [49]           |
| 徐佑根烈士简介 .....                           | 徐德静 提供 [51]        |
| “红益报”概况 .....                           | 陈肇源 [52]           |
| 我接办《益报》始末 .....                         | 胡霖生 口述 熊朝阳 记录 [53] |
| 办《果园》是我们步入社会的洗礼 .....                   | 陈配虞 [59]           |
| 忆往录 .....                               | 李竹铭 [62]           |
| 《醒民日报》简介 .....                          | 周芷颖 [65]           |
| 反动派破坏《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侧记 .....                 | 李 英 [65]           |
| 民国三十七年成都报刊新闻业概况 .....                   | 成都市第一档案馆编研科 [70]   |
| 成都报刊编年目录补遗 .....                        | 王露萍 [47]           |
| 第一辑需更正以下几处 .....                        | 巫怀毅 章伯怀 [72]       |
| 封 面 .....                               | 张鸿奎                |
| 封 一 前方浴血抗战 后方加紧生产(木刻) .....             | 张漾兮 遗作             |
| 封 二 本报召开第二次修志座谈会照片、签名 .....             | 赵 白                |
| 封 底 何郝炬同志诗作,何郝炬与谢国定两个老朋友在一起的照片<br>..... | 谢国定 供稿             |

市书刊印刷许可证8105号(内部发行)

《成都晚报》印刷厂印刷,

每期工本费0.60元 出版时间1985.8

# 抗战前至抗战初期的《四川日报》

张爱和 陈明泉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都和其他后方城市一样，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应运而生。《大声周刊》、《星芒救亡联合周报》、《火炬半月刊》、《金箭月刊》、《战旗旬刊》、《图存周刊》、《抗战星期刊》、《抗日先锋周刊》、《抗敌周刊》、《救亡周刊》、《新时代旬刊》、《国难三日刊》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众多报刊中，有一家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报纸——《四川日报》，值得一番介绍。

## 一、《四川日报》的简历

1936年7月下旬，重庆文化新闻界人士毛畅熙、陈远光、蒲剑秋等在一起，谈及“当此国难紧急之期，吾人为尽匹夫之责，实有发刊报纸，警省国人共起救国之必要。”①开始酝酿创办《四川日报》。旋即由毛、陈二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利用蒲剑秋所佃住的售珠市街21号的两间小屋，分作编辑、发行办事地点，当年8月7日，

《四川日报》正式发刊。毛畅熙为该报董事长，陈远光任社长兼总编辑，并主编本省市，陈德尊兼编中外，郑自昭主编副刊，蒲剑秋充主笔，并负责言论动向，赵慕归担任事务工作。后来，陈远光的夫人康玉洁也参加了经营管理。她和杨亚夫还先后担任过社长。在重庆时期，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杜桴生、黄琪敏（黄启明）。《四川日报》问世以后，“由于内容比较新颖、开放，颇受社会人士的欢迎，以故声价无形提高，销路日见扩大。”②加上广告收入日益增多，报纸规模迅速扩大，至10月1日起，便由原来的每日对开四版增至每日两大张，共八版。这时社址迁往肖家凉亭，以后又先后迁居苍坪街及通远门外新市区等地。1937年3月中旬，《四川日报》迁成都华兴正街49号。迁移期间，停刊了一个多月，5月5日，正式在成都与读者见面。

《四川日报》在成都出版以后，毛畅熙到省府政闻编审委员会供职，其他人员也迭有变更。抗战爆发以后，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开始恢复发展，并逐渐派骨干力量参加《四川日



图为《四川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成都各界纪念五卅宣传大会特刊》。

张爱和 供稿

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已担任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的杜桴生，担任《四川日报》总编辑。后来韩天石接任市委书记，杜桴生任省工委文委书记，仍负责《四川日报》的工作。除杜桴生外，党内还有刘彦槐、朱亚凡、朱一帆、黄琪敏和叶凯（又名叶勉）等在该报任职。《四川日报》实际已掌握在成都党组织的手中。一九三八年夏季，胡绩伟也曾在该报作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四川日报》进一步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变，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后方舆论宣传战线上。

为了巩固这个宣传阵地，报社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政治上，《四川日报》既要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方向，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又要顶住各种压力、争取大多数群众，力求使报纸不被查封。在经济上，《四川日报》属民营报纸，得不到官方的资助，主要靠登广告来维持，加之报社无印刷设施，要交印刷厂承印，纸张也需购买，因此，经费十分紧张，甚至编辑人员的生活费也不能保证。由于种种原因，《四川日报》先后于1937年9月16日至18日、1938年2月21日至3月7日、7月17日至×日，1939年1月8日至11日，数次停刊，并从1937年9月19日起改为四开小版张。但它停刊后不久又努力复刊，继续坚持救亡宣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后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受到限制和破坏。《四川日报》迎着逆流，仍然在新闻战线上坚持战斗，继续刊登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英勇抗击日寇的消息，报道共产党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和主张。《四川日报》坚持办到1939年4月30日，终因经费困难停刊。此后，由于重新登记困难，就顶用《民声报》的名义出刊，杜桴生任总主笔，朱理君任社长，彭其年任总编辑，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舆论宣传工作。《四川日报》从问世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共出刊710号。

## 二、《四川日报》的主要内容

### 1. 发表大量的抗日社论、短评和反映形势的报道

《四川日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抗战初期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并发表了数百篇社论和评论文章，呼吁团结抗战。这些言论和报道旗帜鲜明，义正辞严，在当时成都各报刊中，堪称楷模。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骤。《四川日报》迁蓉后，在成都复刊的当月（1937年5月）便连续刊登日军在华北、沪东、渤海湾及塘沽海面制造武装挑衅事件的消息。③6月2日，又以《企图转移国民视线，积极策动武装侵华》为题，刊载《四川日报》北平专电，提醒国人，在“日阁总辞后，日法西（斯）运动激化，少壮派军人坚决主张在本月内策动华北武装侵略，以直接行动对华，转移日本国民视线，故近日华北局势，转趋紧张。”6月26日、30日，又在副刊的《一日一谈》上发表评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号召民众团结抗敌。文中写道：“忍耐着，忍耐着，整整的五年了，这惨痛的日子……而今，敌人的一只魔手，又想来席卷我们整个的华北，平津丰台……人们从心底里发出了反抗的怒吼，要挣脱敌人给予我们的锁链。这怒吼，象山洪之奔流，象野火之燃

烧，谐和起来，成了一支雄壮的反抗的曲子。”“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如奴的屈伏〔服〕，一条是英勇的斗争。……这是事实，铁一般的事实。”

《四川日报》在得悉芦沟桥战事发生的消息后，立即发表了《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民族的敬礼》的社论。文章呼吁：“国家民族已届生死关头，整个的抗战，乃为今后之唯一出路，爰陈数义，以告国人，救亡图存，自今日始。”以后数日，该报又连续发表了《肃清入室之寇》、《日军再攻宛芦》、《光荣的抗战》、《和平与战争》、《整军与杀敌》、《索还血债》、《全国总动员》、《援助华北抗日民众》等社论与评论文章。文中指出：“敌人已把我们逼到了最后关头，不是抗战，便是投降，这期间已毫没有另外一条可走的路了。”

“我们不应再无耻的喊着忍让等待的口号，坐使敌人长驱直入，……只有展开全民族抗敌战斗，答复敌人武力的侵略。”为了民族的生路，只有一个方法，战！”

紧接着，《四川日报》又以大量的社论和文章，对全国各界同胞、特别是四川人民的救国呼声、当局的态度以及抗战爆发后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述和报道。如7月18日以“各界续电当局，坚请抗战到底。忽战忽和不外迫我屈服，务望激励士气，勿堕奸计”为题，报道了“自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本市各界均深痛愤，连日均纷纷电请当局动员抗敌，并慰劳前方守土将士。”同日在副刊上又发表文章，评论当时的中日谈判，指出：“日本是否有和平的诚意？谈判的时候（以）什么为原则？我们的和平使节是否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这些，都是全国民众十分关心的。”“在和平谈判的进行中，我们决不要过分的相信敌人，忽略了军事上的防御工作，上敌人的大当。”必须“以全民族的血与肉，筑起我们自己的长城。我们……决不能再在这耻辱的谈判中带来新的耻辱，写下国家民族的卖身契。”7月23日，发表了《释领土与主权完整》的社论，指出：“领土与主权，同为国家存在之要素，二者缺一，则国家不成其为国家。”并提出了中日交涉的先决条件：“（一）华北日军完全撤退回国。

（二）交涉移在南京举行。“我国答应和谈的条件应当是（一）东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等领土之收回。（二）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三）辛丑条约之根本取消。（四）内政范围内之任何事件，绝对拒绝一切外力之干涉。”而以上条件如不能实现，“就是领土主权不完整，就无从言和，中国人就只有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达到领土与主权完整之目的，那就是战。”7月25日社论《到和平之路》更为明确地指出“吾人厌弃战争，反对战争，视战争为人类公敌，一若残暴之狼。然而制狼之术，至少须有如狼之力，若图以义理之辩，以怀仁之德，乃至婉转之恳求与穷兵黩武者相见，无异羊与狼交，自暴其愚，其结果靡不以血肉果狼之腹！”“不幸地方当局，昧于斯理，企图以交涉方式，获取和平之保障，分派专员，折冲〔衷〕樽俎，信誓旦旦……殊我芦宛驻军一撤再撤，则日军一增再增，所谓诺言，终成缓兵诡计。继而日方军事布置停妥，大兵结集平津要隘，由无条件撤兵，进而为有条件之交涉，我于一再受愚之后，仍不自醒，津电所传，丧权辱国之条件，亦经承受，已极尽吃耳光陪笑脸之能事……吾人唯有给打击者以打击，用战争消弥战争，终有达到真正和平之一日。为了公理、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恒久光荣，牺牲到底，非所计也。”

“八、一三”以后，日本侵略者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增兵。这一时期《四川日报》几乎每日出一篇抗日救亡的社论。如《第二次‘一二八’之前夜》、《鉴往知来》、《为世界而奋斗》、《英勇的抗战、壮烈的牺牲》、《马上动手、肃清仇货》、《近卫之黠武宣言》、《平津上海与青岛》、《长期抗战与最后胜利》等，介绍上海十九路军爱国官兵英勇

抗敌的事迹，进一步向全国人民提出，对日本侵略者“唯有痛予打击、痛予跟追，痛予歼灭，以确保我领土与主权。”④在这一时期的社论中，也评论了中日战争发生后，英美等国的态度，如《中日两国军队撤退上海的要求——评英政府这一要求》、《以外舰行止测各国意向》、《‘调停’、‘制止’与‘中立区’》、《不干涉的协定与干涉的要求》、《美向中日申请停战》、《美国‘中立法’之实施》、《可注意之英美态度》等，其中分析了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也损害了英美的一些在华利益，但英美帝国主义绝不会为此作得不偿失的牺牲，所以他们从中“调停”是有限度的，它们总是首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前提。文章提醒“决心抗战到底的中国人，（要）谨防国际间的‘投机者’与‘捉机者’。”文章特别谴责了英美帝国主义助纣为虐，纵容和支持日寇侵华的无耻行径，指出“英美等国军舰，容许日舰在其附近停泊以图阻碍我军猛攻……英国联络列强向中日双方提议，沿公共租界划中立区并请中日两军撤退。……列强如欲为和平求保障，应请设法予暴力以制裁。而不必借中立、‘调解’为名，以阻碍被侵略者的反抗，须知我们为生存而战，当不惜重大牺牲，以超越任何障碍也。”

《四川日报》的社论和短评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为之所作的努力。1937年9月24日的社论《读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芦沟桥与上海之炮声，系促成各党派团结救亡之紧急号令，中国共产党为国内在野有数政党之一，在全面抗战展开之先，虽然早与当政之中国国民党有团结对外之事实表现，然而促使此项团结之提早完成，促使红军改编之提早实现，芦沟桥与上海事变，实为最大之压力。在敌军南北进犯之今日，吾人阅读共产党之沉痛宣言，益觉由抗战而展开的中华民族前途之远大！”该文还指出“惟恐国共不能合作而为国事忧惧者，至今可以释念；惟恐国共合作而引起政治上之剧变者，至今亦可释念；吾人今后之责任为何？惟望此种团结，因抗战彻底而日益坚强，达到中华民族之真正统一。”该报在10月1日至8日的“来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由于新的政治形势的决定，而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不仅于中国整个民族有利，而于既成政权的国民党也有益”。“事实证明，中共是在忠实的执行他正确的路线”。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大段关于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批判国共合作的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10月10日，《四川日报》编辑、共产党员黄琪敏（即黄启明）发表了《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的评论文章，表明了《四川日报》对国共合作的正确认识和鲜明态度：“……十年来国民党人放弃了中山先生的遗训、脱离民众，在外交上游离不定，以致演成我国土日蹙千里，山河破碎的悲惨结果。”“好在自本年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与民更始，摒弃过去成见，重定新的国策，继承中山先生遗教，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苏联接近，在国内重新与共产党合作，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等，展开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从此显露了一线的曙光！”

## 2、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和具体活动

《四川日报》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敌的战迹，介绍边区军民轰轰烈烈的救亡活动。

1937年12月23至25日《四川日报》以大量篇幅登载了采访毛泽东的专题报道。毛泽东对抗战五个多月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统一战线、抗战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总结。其中谈道，“从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后，不容讳言，我们在抗战的军事上受了相当的挫

折,但在各个战场的挫折中,使我们获得了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民族抗战,虽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还不完全。……最大的缺憾是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必然会遭遇失败的。”“眼前最要紧的是改造军队素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还谈到八路军的战迹和今后的军事策略:“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冀察晋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蒲路的交通线。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毁敌人的后方。我敢说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却是一枚炸弹。”毛泽东在这次谈论中非常策略地批评了国民党军事路线和群众工作的错误,最后强调:“我们特别要在这个抗战的紧急阶段,以最大的努力来巩固抗日的统一战线。”

《四川日报》还登载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毛泽东在这次答记者问中,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中国抗战形势、统一战线的基础、政治民主、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其抗日战略方针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其中特别强调指出:“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和其他政党的政策已遭失败,事实教训了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当前统一战线是行之有效的,首先有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弃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新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思想是恰能相容的,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理论基础。……当今抗日救亡更有现实意义。”“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共产党有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等。这绝不是新的理论,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而见诸实际行动,则既有害统一而又有害抗日,则是使中国既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了危险。因此这一思想客观上一定会被日本法西斯军阀和汉奸所利用。……这就不能不唤起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而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述,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鼓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谬论。

此外,《四川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接见记者时的谈话。毛泽东在边区县长会议上的讲演。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对国民党参政会的意见等文章。这对后方各界群众了解和学习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加强救亡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⑦

《四川日报》还刊登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其他领导人的专访。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吴玉章、徐海东等的讲演或文章都在该报上发表过,在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9月30日至10月5日,《四川日报》以“特载”形式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长篇讲话,由《四川日报》特邀西安记者于9月6日亲访延安后整理而成。记者请朱德总司令谈华北抗战形势、统一战线的成绩、国共两党的关系、八路军如何开展游击战、八路军怎样对待俘虏等问题。朱德对此一一作了回答、他着重指出:“在敌人(欲使我们)亡国灭种的情形下,华北人民是空前的团结起来了,还因为有了这样的团结,所以我们才能创造了许多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凡有统一战线的地方,就有广大

的群众基础，就能打击敌人；没有统一战线的地方，群众就不能起来，受尽敌人的蹂躏。”他还谈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同人民血肉相连，人民拥戴。八路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八路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员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这样的军队有优良的作风，强大的战斗力。当时敌人的二十四师团每到一处，便以手势询问有无八路军，一听到“八”字就失魂落魄。八路军对被俘日本兵作深入细致的开化、诱导工作，日俘开始顽固，八路军不虐待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甚至胜过自己，使日本俘虏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阀。

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四川日报》连续七天登载了《周恩来先生访问记》。周恩来在“答记者问”中对华北抗日形势和中共的任务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说明。1938年4月19日，《四川日报》又刊登了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的广播讲话，他强调了鲁西战役胜利的意义。还谈到日本侵略者准备新的进攻的严峻形势，号召全国各界加强团结，争取新的胜利。

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其他领导人的言论和访问记，也在《四川日报》上时有出现。如彭德怀副司令员在晋东南某县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谈抗日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和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指出“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摩擦，都是危害抗战胜利前途的”。⑧在《中国的夏伯阳——贺龙》一文中，作者高度赞扬了八路军将领贺龙，称他为“出色的军事家”，“忠诚保卫祖国，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艰难困苦，绝不能动摇他的信心。”文中还着重介绍贺龙如何驳斥国民党右派污蔑八路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他例举苏俄反击国内外反动派的革命战争，最初由小的游击队组成大规模的正规军，游击战与阵地战配合，最后赶走了侵略者，巩固了苏维埃。又举西班牙战争，各党各派各军为保卫首都马德里，都发起了游击战。再举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指出：“敌人攻下太原后，为什么不能完全占领山西，为什么把兵力集中雁门关，要进攻八路军？这很简单，他害怕扰乱后方致它死命的游击队。敌人害怕我们游击队，正是证明，我们抗战采取游击战术是绝对正确的。”⑨在《叶挺印象记》的特写中，介绍了新四军军长叶挺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的伟大精神，出色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优良的生活作风⑩。《四川日报》还刊载了不少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写的文章，如《我们怎样打退正太路的敌人》（刘伯承）《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任弼时）、《冀察晋抗战回忆》（徐海东）、《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徐向前）、《论统一战线》（吴玉章）。读者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形势、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⑪《四川日报》通过这些报道，使广大后方群众直接了解和认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看到胜利的希望。

热情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取得军事胜利，报道边区军民的救亡活动，鼓励后方人民团结奋斗，支援前方，也是《四川日报》的一大特点。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出后，该报便以大量篇幅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振奋人心的战斗。并予以高度的赞扬。以后，又连续多次报道和评述，还刊登了歌颂这次伟大胜利的文艺作品。⑫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迹象日趋明显，后方政治形势逐渐紧张，《四川日报》仍顶着逆流，继续报道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战斗的事迹，如《以铁血作纪念，新四军告捷》、《新四军活跃苏皖各地》、《军民合作的模范》、《东北抗日军巨史》等，表现了该报坚持团结

抗敌，反对分裂倒退的办报方向。<sup>⑬</sup>

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动员》一文中，作者报道了边区民众武装组织的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化，如“抗日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该文对这些组织的发展状况、武器装备，参加者的年龄条件也作了介绍。此外，还谈到了如何优待抗战军人及家属等问题。《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会访问记》，是作者亲临实地采访后写成的。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齐华对作者谈到了边区后援工作的特点，他说：“第一点，就是边区政府对我们的活动，尽可能的予我们以帮助和工作的便利。政府、军队、民众之间，没有丝毫隔膜，早已打成一片。第二点，民众在长期斗争中有着政治认识 and 实际斗争经验，差不多每个乡村角落里的老太婆和小娃娃，对日本鬼子有着十分痛恨的心情，……第三点，做工作的干部，锻炼了一种艰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有着革命热忱和作风。第四点，就是后援会的系统，虽然层层而下，但它们各级组织都能在总的纲领下发挥单独活动的能力。”<sup>⑭</sup>该文作者还参观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并撰文盛赞“抗大的精神，确有着许多崇高伟大的地方值得介绍。”<sup>⑮</sup>在《延安抗日大学访问记》中，撰写该文的作者首先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八路军，他写道：“数年以来，他们不断的呼吁：全国武装力量一致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他们为达到北上抗日计，曾作数万里的长征，备尝艰苦，终至于达到陕甘宁夏一带。国人对他们的真诚抗日，百折不回的伟大精神，无不钦佩。”后又介绍了延安抗大的基本情况，并引用抗大招生布告栏说明其宗旨：“中华民族已经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本校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的领导人材，特决定招揽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期培养和造成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sup>⑯</sup>

《四川日报》还通过《陕甘托儿所访问记》、《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地位》、《延安的画展经过》、《街头诗运动在延安》等文章和采访报道，真实生动地介绍了边区的妇女工作，文化宣传工作如何与救亡运动相结合。<sup>⑰</sup>

### 3、报道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四川日报》坚决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团结全国各党派团体，各界群众目标一致抗击日本侵略，极力宣传和报道各界的救亡活动，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各级将领，乃至蒋介石的抗日言论和声明，以及国民党爱国官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战役。

七·七事变发生后，《四川日报》登载了赞颂二十九军奋勇御敌的评论文章，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同敌人搏斗。上海战事发生后，《四川日报》立即公布《我政府发表声明书，抵抗暴日实行自卫》的新闻，着重引用“日本人暴行危害我国家独立民族生存，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一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我之自卫权。”紧接着又报道了上海保卫战的情况，指出：“我军进攻以血肉相搏，颇有损失，敌拼死抵御，屡战屡北，创伤大巨。”说明国民党爱国官兵抗击敌寇，斗争是悲壮的。<sup>⑱</sup>1938年4月9日，《四川日报》以《抗战以来空前胜利》为题，报道了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次日又发表《庆祝台儿庄胜利以后》的社论，指出：台儿庄战役“将敌坂垣、矶谷两师团主力歼灭了”、“而侵华敌军还有二十师团左右，……我们需要努力……直至完全胜利。”提醒全国人民在胜利面前认清形势，作

好继续战斗的准备。

《四川日报》热情介绍川军整编出征抗日的情况。芦沟桥事件爆发后,《四川日报》于7月15日以《全国上下共赴国难》为标题,登载刘湘的抗日通电,称“战则犹有生机,不战则亡可立待,师以直为壮,公理终必战胜强权。”上海战事发生后,刘湘于8月14日电复四川各县抗敌会,又称“刻川康各军陆续整编完竣,敌忾同仇,誓与暴日不共戴天也。”9月5日,《四川日报》开辟了《欢送出川抗敌将士特刊》,登载了《对出川抗敌将士致敬》、《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欢送川军,临别赠言》、《愿献这颗心》、《‘成功’与‘成仁’》、《誓不生还,抗战到底》等各界赞扬和勉励川军抗日的文章。《四川日报》编辑、共产党员黄琪敏也撰文《是狮子,还是绵羊》,指出“今天,吾省十余万健儿奉命出川抗敌,是为了保卫国家,同时也是保卫自己……全面抗敌即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处处是战场,处处是战士,所以,川军此次出征,实是应有的责任。”川军出征,“使世界认识中国男儿是狮子,还是绵羊”,“但愿诸将士之血,洒于白山之巅,黑水之滨。还我河山,痛饮沈阳,他日凯旋归来,我们再次迎于剑阁夔门道上,其盛况当将百倍于今日也!”此后,《四川日报》又陆续报道了川军将士奋勇抗敌的一些战斗事迹和以身殉国的消息。1938年3月22日以《川军健儿血战滕县,忠勇将士壮烈牺牲》为题,报道了四十一军孙德操部王铭章师坚守滕县的战斗。此役川军师长王铭章和无数爱国官兵均为抗战捐躯。《四川日报》的报道中向烈士表示了沉痛哀悼,并呼吁家乡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更英勇无畏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战救亡运动中去。

《四川日报》还注重登载全国知名人士的抗日演讲和文章,以此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国共合作的局面刚刚形成,《四川日报》便在“特载”栏中刊登了宋庆龄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宋庆龄谈到她得知国共合作的抗日斗争局面终于实现时,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怀着善良的愿望,从团结御敌的大局出发,语重心长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民党同志应该记着,要是不顾孙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共产党同志也应该记住,只有在孙总理遗教领导之下,和国民党真诚坦白合作,全民打成一片,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惨痛的教训,再加上日寇的残酷进攻,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惟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sup>②0</sup>1938年7月11日,《四川日报》又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抗战一周年》。她总结了抗战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指出要警惕日本侵略者诱降的阴谋,并且应“迅速整顿纲纪,自上而下不容一个投机贪污之辈。”1937年10月6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何香凝所题“赠前线将士”的诗:“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存。”除此之外,《四川日报》还登载了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文章,如李公朴的《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文中谈到后方城市如何保护战区逃亡出来的青年;我国在外交上不要幻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出兵打击日本法西斯,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世界和平舆论的声援来争取救亡图存。<sup>②1</sup>又如马寅初在成都建委会作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科学实验等问题的讲演;沈钧儒在成都青年会大礼堂作抗战形势和前途等问题的讲演等,《四川日报》也及时进行报道。<sup>②2</sup>

《四川日报》还刊登抗战时期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国外友人的文章,介绍他们的书籍。如1938年1月18日,专门介绍了斯诺所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一书,并着重标明

“本书为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是中华民族坚毅不屈的最大表现。这种精神，正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之一。爱国志士，不可不读。”1月20日又登载了史沫莱特日记片断，记叙作者在中国临汾的见闻。3月12日至15日，又特别刊登了斯特朗的文章《第八路军》，这篇文章以深厚的感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特点和作风。文章指出：“从外国军事观察者看来，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效率的军队。我从美德英方面听到的意见都是这样说，而八路军还有某些特点，为其他军队所没有。”“第一，他们教育每个普通士兵，为什么作战，每天士兵上三课：军事训练、文化训练、政治训练。……第二个特点，是兵士和官长间的同志的感情。兵士们尊敬朱德，象中国人尊敬父亲一样，并不象兵士们对于一个将军的那样害怕。”“第三，对民众解释战争并组织民众。”文章又谈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最后又谈到周恩来的伟大胸怀和远大目光。

抗战初期，成都各界团结抗战，组成各种救亡团体，积极从事救亡活动，《四川日报》对此总是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如1938年7月4日，该报登载了《本市各界救亡团体对国民参议会提出九项建议》，“即加强团结，巩固抗战，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开放民众运动，动员全国人力；健全各级国民参政机关；健全各级政治机构，集中各方人才；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战时生产；加紧军事补充，增辟国际通道；实施战时教育；扩大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巩固后方安定，完成四川建设。这些报道对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加强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壮大群众救亡队伍，起到推动作用。

#### 4、开辟内容丰富的救亡专栏

《四川日报》以极大的热忱，克服重重困难，在副刊上开辟内容丰富的救亡专栏，种类之多，篇幅之大，反映面之宽，创办时间之长，在当时成都各报中都是罕见的。

《四川日报》在成都出版后，开辟新编《四川日报副刊》，基本上每日一刊，内容是综合性的，包括时事、经济、文化、要闻简讯和新书介绍等。还保留了原来的《文化界》专栏，也是每日一刊，主要反映文艺界情况。此外，还刊登过《金箭》、《交通周刊》、《史学》等专栏。《金箭》于1937年5月31日创刊，金箭文艺社主编，通讯处设在四川大学文学院。《金箭》在改刊前一共出了7期，主要由文学界人士撰稿，内容有各种文学作品，文艺界的学术讨论情况等。《交通周刊》于1937年6月1日创刊，内容主要谈四川的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国防军事的关系，在改刊前一共办了4期。《史学》专刊于1937年6月4日出版，但只发现创刊号，主要谈历史与救亡运动的关系。以后被《史地知识》所取代。

七·七事变以后，《四川日报》于当年8月2日将原来的副刊作了较大调整。原来的《四川日报副刊》、《交通周刊》、《史学》专栏不复存在，另外增辟了多种专栏，出刊日期分配为：星期一《科学丛谈》，星期二《体育与童军》，星期三《政治与经济》，星期四《妇女园地》，星期五《现代教育》，星期六《戏剧电影与音乐》，星期日《金箭》。原来的《文化界》仍然保留，还增加了不定期刊《生活剪影》。

到1937年9月11日，《金箭》一共出到12期，后来与《金箭》月刊合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刊物，不再在《四川日报》上登载了。当时，《金箭》表明它创办的起因是，“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殖民地深化的阶段上，一部份热情的文艺青年想负起他们的任务，固然他们的力量是那么薄弱，然而这也就是在民族生存斗争中的一火花。《金箭》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汉奸卖国贼对抗战文艺诬蔑毒骂和造谣中伤，……这个现象在中国文坛上是屡见不

鲜。目前再加上倍多日金的诱惑，当更其普遍。至于它——金箭，是决不会因之稍有妥协的。”因为“金箭是斗争的孩子，生长在斗争里”。《金箭》的计划是：“一、打击在客观上含有汉奸作用的文艺理论与作品。二、揭开侵略者的罪恶及丑态。三、撕碎黑暗处的包皮，呈现大众真实的苦痛与惨状。四、给一切阻碍历史进展及民族解放的混蛋——汉奸以无情的挞打。五、号召一切被压迫者集中在反帝反汉奸的救亡的旗帜下。”从《金箭》各期的内容看，它确实遵循了自己的宗旨，以文艺为武器，为抗战救亡大声疾呼。

《科学丛谈》于1937年8月2日创刊，到1938年7月11日，共查阅到40期。在《发刊缘起》中，《科学丛谈》作了自我介绍：“中国科学落后，因此，整个的国家也就降入了被侵略的地位，一切物质文明的享受，生活的改进，我们都没福分。而同时，科学发达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馈赠给我们的唯一礼物，是大炮、炸弹、坦克车、毒瓦斯……”因此，《科学丛谈》要以科学为武器，教育和武装人民，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科学丛谈》为配合后方救亡工作，大部分内容用来介绍科技知识，尤其是军事科学常识。如前几期重点介绍了防毒面具的构造、原理及使用方法，同时也在文章中也谴责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同胞施放毒气弹的罪恶。此外，《科学丛谈》还辟有《信手拈来》（科技知识小品）、《杂讯》（科技简讯）等栏目。《科学丛谈》以后各期中，多有“本刊投稿，纯系义务”的字样，说明该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有着不为名利、热心从事救亡宣传工作的可贵精神。

《体育与童年》于1937年8月3日创刊，以后出刊日期不太固定，到当年12月24日共查阅到19期。它的发刊词中介绍说：“我国体育，本属落后，吾川更不忍言，其谁之过欤？故敢言同志未尽责也。兹得宛芦事件发生后，天津失守，北平危急之种种恶耗传来，而各同志又本着‘救国不忘体育’、‘体育不忘救国’之意，除负本身应尽之职责外，拟发专刊，唤起民众，认识‘体育与童军’，视全民体魄之强弱，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终因无良好机会而罢论。适逢四川日报诸先生，深知此意，特辟《体育与童军》一栏，于每周星期二，专供忠实于‘体育与童军’同志之工作地点。”《体育与童军》以当时童子军组织为主要对象，配合学校的体育活动进行宣传。如介绍童子军的训练方法（游戏、比赛、演剧、实验、观察、表演、讨论、演讲、阅读等），还将一些军体常识和国防游戏介绍给儿童，灌输爱国主义教育，这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体育与童军》也报道当时成都体育界的组织状况和活动，发表体育教学和体育工作方面的文章评论。

《政治与经济》于1937年8月4日创刊。创刊号中说明该刊创设的原因和目的是：“我们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耳听着大众底嗟伤，眼看着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而芦沟桥的事件，更揭开了敌人掠夺华北的阴谋，也从此展开了全部灭亡全民族的毒剧。站在这生与死的转弯处，为了全民族底生存，为了全世界的和平，我们只有抗战，只有马上发动全民的抗战！可是，我们要担负这巨重的使命，……非彻底了解整个世界底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动向不可。”“这小小的东西，便是本着这个希望，尽它绵薄的力量，使一般民众多了解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加强大家底认识，从早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

《政治与经济》专栏的最大特点是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后方救亡工作的特点，把经济常识寓于时事政治教育之中。如前几期该刊连载了《华北的经济——我们的生命线》一文，对华北的地理位置、土地、人口、农业、矿产、工业、贸易、交通、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知识加以概述，接着对华北沦陷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加以评述，指出，华北“不但是历史上文物〔化〕的中

枢，而且在今日，更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欲中国现代化，自不能不仰赖于华北，欲完成中国国防，尤不能不以华北为基础。若华北不守，效古公亶父避狄的行为，那么“资盗以粮”，暴日单以华北的经济力量而亡我有余。俗话说：“将你的骨头来熬你的油”，中国便永无翻身的日子了。”在《政经常识小问答》的栏目中，又以“九·一八事件”以来我国遭受的损失为例，提出：“你可知道？六年来丧失了六百万方(公)里的土地，约等于四川省面积的六倍；六年来丢失了四千五百万的人民；东四省年产大豆一万万担，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三十七；东四省铁的储藏量达九万万吨，占全国储藏量百分之七十七；东四省年产煤九百余万吨，占全国年产额三分之一，……”<sup>②</sup>此外，《政治与经济》专栏还刊登分析日本经济实力、战争消耗、资源缺乏、通货膨胀等问题的文章，提出中国坚持长久抗战定能驱逐日寇的预言。

《妇女园地》从1937年8月5日创刊到1938年4月16日，一共刊登过33期，加上1938年3月27日的《成都市各界欢送妇女战地服务团特刊》，共为34期。1938年8月2日的《关于妇女园地》一文指出：“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争取全民族的生存，我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非同男子们一齐来肩负起救亡的责任，唤醒全国妇女在抗敌的旗帜下工作不可。‘妇女园地’就在这极严重的时机，负着这样重大的使命诞生了。希望它能够顺利地达到我们预期目的，完成这伟大的民族革命，获得妇女真正的解放。”《妇女园地》的文章主要形式有“一、论文，二、短评，三、常识讲话，四、生活记录，五、圈外人的述描。”在评论性文章中，多以提高妇女觉悟，号召妇女克服封建束缚，投身救亡运动为目的。如创刊号中就有《救亡运动中妇女应有的态度》，《统一抗战与妇女运动》、《国家亡了妇女回到哪里去》等文章，其中提出，妇女应该克服主、客观方面的弱点和困难，“妇女运动当无条件的走向民族革命斗争的‘统一抗战’的阵线，去加强抗战力量。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有的文章也为团结抗战，保护妇女合法权利而呼吁，如《默退》一文，就是把“抗日七君子”被捕一事，用来与成都××学校将一些从事救亡活动的女学生送进“学校监狱”作比较，指出“默退”这些女学生，就是变相地断送她们的学业，进而提出爱国无罪，谴责学校当局。<sup>③</sup>此外，《妇女园地》也报道女界信息，反映妇女的愿望和要求，介绍文化科学卫生常识等。

《现代教育》由“民先”的学生界负责人之一彭文龙主编，于1937年8月6日创刊，到当年12月3日，共出17期，从12月10日起，为《战时教育》取代。《战时教育》到1938年1月17日止，又出了7期，从3月13日开始，《战时教育》由帅如先生主编，又定为第1期，并出了发刊词，至5月8日，出到8期。前后合计，共32期。《现代教育》的发刊词指出，它创办的动机和宗旨是：“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是不识字的。……无疑的，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适应大家需要的教育体系。”“中华民族已达到它底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时代赋予中国民族大众的历史任务和实践的课题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大众的解放！现阶段的教育是只有在这解放的斗争过程当中，才能显示它历史的实在性和发挥教育底本质的作用。”“旧的社会和旧的时代就好比一列囚车，旧的教育便成了这囚车的驾驶人。我们这群时代的青年只不过是这囚车里失去自由的奴隶，难道我们甘愿它开往黑暗的深处而带来我们深恶痛绝的毁灭吗？不！青年们，我们不但要踢开这驾驶人，更要打破这囚车！我们不但要替教育找寻新的出路，同时，更要从教育斗争中争取我们自己的明天！”《现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论述教育工作如何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介绍教育史、教育科学知

识,当代教育状况。反映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呼声和要求,提出战时教育的改革措施等等。如创刊号中有《华北抗战与教育青年》、《中国复古主义教育思想的剖析》等文章。以后各期又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铁蹄下的冀东教育》(揭露这种教育灌输尊孔读经,中日亲善,奴化思想,三贞九烈等)、《我希望于今日的教育当局》(提出减少课程,扩大招生,减少学杂费和学生额外负担等)、《开放学生爱国运动,实施国难教育》(要求获得参加救亡工作的正当权利,开设国难教育课程,禁止打骂和虐待学生)等等。<sup>②5</sup>

《戏剧电影与音乐》也是《四川日报》副刊改刊后的产物。从1937年8月7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共查阅到25期。该专栏主要刊登文艺界人士评论电影、戏剧、音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文章,发表救亡文艺作品,报道影剧界的救亡活动。如前几期登载了《当前成都话剧运动的几个问题》、《谈音乐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戏剧在抗战中》、《银幕上的‘十字街头’》、《怎样组织歌咏团》等。以后又陆续刊登了影剧界一些名人的作品和文章,如光未然的《战时戏剧引论》、陈凝秋的《战时的新兴戏剧》、陈白尘的街头报告剧《扫射》、田汉的话剧本《保卫芦沟桥》等。1937年12月4日,该刊又出了《抗战专号》,重点介绍了国防剧社成立后在成都作救亡演出的经过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以后又报道了上海影人剧团赴蓉演出的经过和成都工人剧的创作和演出等。<sup>②6</sup>

《文化界》是《四川日报》创办时间最长,期数最多的专栏。从《四川日报》迁蓉出版至1938年2月19日,几乎每日一期。《文化界》辟有时事征文,青年之声,文化情报,书报介绍等栏目,主要内容有:1、文化界人士呼吁团结抗战的文章、评论,如“七·七事变”以后连续发表了《为了真和平而战》、《算血账的时候到了》、《关于芦沟桥事件应有的认识》、《日军进攻宛平与我们应取的对策》、《抗战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予打击者以打击》、《赠二十九军》、《保卫芦沟桥》、《用战争回答战争》等文章;2、文化界人士撰写的有关文化运动、文艺理论、文化名人纪念方面的文章,如《谈谈中国目前的教育》、《谈集体创作》、《纪念革命歌人聂耳》、《文化运动之重要性》、《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3、文化界人士和社团的活动,如报道沈钧儒、史良等在狱中的活动,各界欢迎“抗日七君子”出狱,郭沫若、陶行知归国赴难的消息,以及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华西大学的救亡活动等;4、介绍抗日救亡书刊,如,由郭沫若、茅盾、夏衍整理,沙汀、艾芜、夏征农、张天翼、陈白尘、金人等二十余位作家集体创作的《华北事变演义》,冯玉祥的诗《女军人》,以及苏联作家的一些名著等。《文化界》由于反映面宽,报道及时,并能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如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领导人的访问报道也是出自这个专栏,所以它的影响较深,颇受进步人士称道。

为反映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及其参加救亡活动的史实,《四川日报》还开辟了《工人园地》和《生活线》专栏。《工人园地》于1937年10月1日创刊,至12月3日共出了11期,此后改名为《生活线》,至1938年7月16日,共查阅到22期,两者合计,共有33期。《工人园地》和《生活线》由《四川日报》编辑黄琪敏和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团长祝子人(二人均为中共党员)任主编,所登载的作品多为工人店员撰写。主要内容是倾诉劳苦大众遭受的战祸和苛政所带来的灾难,提出改善生活待遇和参加救亡运动的呼声和要求,揭露右派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唤起各界群众共赴国难。这些作品简洁明瞭,朴实无华、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在成都工人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宣传效果。

除此而外,《四川日报》还开辟了《谈锋》、《群力》、《文艺阵地》、《诗歌与戏剧》、《文艺周刊》、《青年文艺》、《中国与世界》、《救护界》、《沃野》等各种类型的救亡专栏。其内容与前面介绍的专栏的内容多有类似之处,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 三、《四川日报》的办报经验

#### 1. 坚持革命原则, 讲究斗争艺术。

《四川日报》由新闻界的爱国人士创办。一开始,在宣传上就基本能坚持救亡图存的大方向。以后虽然已掌握在共产党组织手中,但也没有用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出版,而是以党组织为核心,影响《四川日报》的各项工作。这既有利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垄断,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团结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参加救亡活动,又避免敌人找到借口来进行反共宣传。《四川日报》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中,旗帜是鲜明的,同时又注意讲究斗争艺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利于团结教育大多数群众。如“七·七事变”发生后,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奋勇御敌,但终因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致使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四川日报》登载了《芦沟桥战士之诗》两首:“积耻连年非一朝,侵吞今又到芦桥。忍看国土供蚕食,誓杀喽罗不肯饶;大刀起处人头落,铁臂挥时贼胆消。只是将军心未决,和声杂共战声高。”、“范范家国竟何之,肝胆欲焚妥协时。士卒有心歼虏寇,元戎无意复城池;永定河边风瑟瑟,芦沟桥下水淅淅。可怜昨夜酣争地,今日鸣金又罢师。”<sup>②</sup>这是借战士的诗来批评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行为。这样做比报纸正面发议论效果更好,有利于唤起后方群众的觉醒,也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当局中的抵抗派。又如1939年初,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空气下,国民党当局暗中同日本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四川日报》就借蒋介石自己讲过的一些漂亮话来反对他的倒行逆施。如蒋介石曾说过“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sup>③</sup>用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更能使其处于被动。

#### 2.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依靠党和群众, 作好宣传工作。

《四川日报》的编辑工作人员多是党员,他们对抗日救亡、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他们心甘情愿艰苦奋斗,当时“有的只支最低的生活费,有的因旁处尚有工作之故,连伙食费也没有开支一文。”<sup>④</sup>他们依靠党组织同延安的联系,了解全国各地情况,扩大新闻来源。读者从报纸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新闻来源是相当广的,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交通阻塞的边区,还是情况复杂的后方,到处都有新闻反映在报纸上。“抗日七君子”在苏州法庭被审,他们登出“特讯”;芦沟桥战事吃紧,也有实地的战况报道;革命圣地延安的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四川日报》更是多次刊登专访,把边区真实生动的救亡活动及时报道给四川人民。《四川日报》还重视社会各界对报纸的反映。如《四川日报》副刊专栏数量多,内容庞杂,报道面宽,要办好这些副刊专栏实属不易,报社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召开多次座谈会,综合改进刊物的各种意见,并将其公诸于世。<sup>⑤</sup>正因为如此,《四川日